

他者化视角下农民工群体的公共表达

倪恺彬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会影响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认知与情感，从而影响弱势群体在社会中获得身份承认与地位尊重的过程。农民工群体是弱势社群的典型代表，本文将以为农民工题材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他者化”视角下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再现问题，并运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优秀的农民工新闻报道内容和结构，为大众媒介对于农民工群体等弱势社群的形象建构和交流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他者化视角；弱势社群；公共表达；农民工题材新闻报道

引言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人群，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1]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会影响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认知与情感，从而影响该弱势群体在社会中获得身份承认与地位尊重的过程。

农民工又称进城务工人员，即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工业化社会转型中，在城市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遭遇着许多歧视和不公待遇，他们虽然在城市中获得了生活、工作的机会，但是其在就业岗位、社会地位以及制度福利保障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是中国城市社会典型的弱势社群。他们在新闻报道中的弱势地位则进一步加深了城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然而，《无声的世界杯》《为了父亲这样的农民工》等优秀的农民工新闻题材作品让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获得了主体表达的机会以传递他们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推动弱势群体与城市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和谐交流。

因此，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与讨论：弱势群体在媒体中的弱势媒介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如何在新闻报道中为弱势社群还原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身份？如何通过新闻报道避免在主流社群中产生歧视弱势社群的情绪？通过回答这些研究问题，本文将探讨农民工题材新闻报道的内容机制，讨论优秀农民工题材报道的内容和结构特点，并为更多有关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关于弱势群体与媒介的关系研究方面，童兵将“他者”的概念引入新闻报道领域，从符号分析、意义建构与解读角度分析了新闻和新闻报道对象背后的权力关系。^[2]朱清河运用场域理论，从弱势群体的匮乏媒体资源和日常媒介视听两个方面，检视了我国现阶段弱势社群的媒介地位同样处于弱势的原因。^[3]

关于媒介对弱势群体的形象塑造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党报、都市报、新媒体平台上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进行了定性研究，探讨不同类别和性质的媒介对于弱势社群形象的话语建构。艾美华运用框架理论，从报道数量、报道议题、报道倾向等维度研究了《人民日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建构。^[4]关汉娜将新闻网络媒体作为拟态环境的媒介，梳理门户网站新浪网各个频道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描述出新媒体平台中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新走势。^[5]李艳红以广州的四家都市报为研究对象，运用叙事分析的方式考察了城市新闻媒体对于农民工这一城市弱势社群的再现，并分析了这些媒介形象塑造对于农民工群体社会身份的形成的影响。^[6]

总而言之，目前对于弱势社群新闻报道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聚焦于探讨媒体对弱势群体形象的话语建构以及弱势群体报道中媒体的角色。另一类则依据新闻实务经验来对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进行经验性总结。因此，本文将会以农民工题材的新闻报道为切入点，在具体分析作品文本的基础上，辅以他者化的理论分析弱势社群和新闻媒体的关系，以期为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媒体如何正确、客观塑造弱势社群形象提供思路和建议。

二、他者化视角下的农民工群体

(一)“他者化”视角下新闻的建构机制

“他者化”是将不同于自己的他人或群体建构为明显区别于主流群体的他者的过程。^[7]殖民扩张时期,欧洲殖民者为了将自身的行为合法化,选择将作为“他者”的新大陆和非洲视为野蛮、落后的“他者”世界。而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他者化”已经跳脱出了身份认同的框架,转向了形象建构的范畴,即主体对自我社会认同建立在对他的想象中。归根结底,从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立场”到存在主义的“自我认同”的寻找,建构“他者”的目的是凸显自我主体的权威和自身行为的合理性。

而新闻生产乃至信息生产的整个过程,包括新闻价值预设、新闻话语的构建和新闻编辑等过程,都可能充斥着对“他者”形象的再现。在新闻价值预设方面,媒介组织往往基于特定的新闻价值观。例如,对于发生在农村的事件,新闻可能更倾向于报道那些符合城市观众对这些地区“贫穷、落后”的预设观念的内容。这种选择不仅传达了关于这些地区的刻板印象,也无形中强化了城乡的二元区别。在新闻话语的构建方面,新闻报道在表达上往往使用特定的语言和框架来描述事件。例如,在本世纪初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使用《半脑少女之恋》《连体女婴之谜》《四岁小夫妻》等猎奇、缺少人文关怀的新闻标题来暗示农民工作为“他者”的混乱与野蛮,而对于发生在城市的类似事件,则可能采用更中性或正面的词汇。而在新闻报道的编辑过程中,则会选择性地展示信息,强调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例如,在报道农民工新闻时,如果过分强调其犯罪率或社会负担,而忽视他们的贡献和面临的挑战,就可能造成对这一群体的负面“他者化”形象。

纵观新闻生产的全流程,我们可以发现新闻很容易就会落入到“他者化”的误区和陷阱中去。即社会现实通过符号传递,而新闻正是这种符号制造的关键方式之一。^[8]谁掌握了这种符号制作的权力,谁也就掌握了向大众塑造“自我”与“他者”形象的权力。

而无论是在《人民日报》这类中央级媒体,还是在《羊城晚报》这类都市报,抑或是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农民工群体报道中,农民工的媒体资源匮乏,日常媒介视听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无论在新闻制造还是在更广义的信息制造上,显然无法拥有这种符号权力,因而无法避免地处于失声和弱势的状态。

(二)“他者化”视角下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典型模式

即便在公平正义成为共识的今天,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往往由处于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媒体,通过记者和编辑对社会事实的筛选、强调后,也还是作为城市的“他者”被描述、被对待。农民工始终保留着素质有待提高、知识有待增长、境遇有待改善的形象。新世纪以来,虽然报道也逐渐重视引述农民工的自我话语,但以“他者”陈述的叙述仍然是报道的主要方式。

例如,各报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存在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可以分别概括为以下四类:“受难”叙事、“受爱护”叙事、“英雄”叙事、“负面行为者”叙事。这些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构成了农民工新闻报道的模板和结构基础,并相应地对应着对于农民工的特定“再现”。

受难叙事的典型例子有农民工遭受工伤事故、工资被拖欠等。而负面叙事的典型例子为农民工群体违法、破坏市容市貌的行为。典型的“受爱护”叙事则为农民工群体享受着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怀。在这类叙事中,党和政府是施予爱护的主体,典型的例子有政府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为农民工提供工伤保障、解决其子女的入学问题。典型的英雄叙事则表现为农民工舍身救人的“英雄行为”、勇于抗争和维权的“讨薪行为”。

而纵观这些典型叙事所造成的影响,市场取向的报纸频繁生产农民工“受难者”与“负面行为者”的形象,往往会导致主流社群对这个群体负面的刻板印象,产生“反民工”的社会情绪和文化歧视,因而阻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获得承认和认可。而官媒“受爱护者”的形象生产,则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党和政府的关照下享有幸福,如果“人民”总是受到党和政府的爱护,那么这个党和政府就是值得人民信任和拥戴的。

而“英雄叙事”虽然有其社会意义,但是这并非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也不能如实反映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媒体通过片面化选择甚至删除农民工在新闻文本中的“自我陈述”,建构起农民工作为“他者”的“差异性”,进一步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

三、农民工题材新闻报道分析

部分优秀的新闻报道跳脱出了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典型模式”,通过刻画人物群像、冲破“他者”桎梏,为大众还原了真实、客观的农民工形象。

在特稿《无声的世界杯》中,作者并没有去着重关注以往农民工新闻报道中频繁关注的农民工讨薪、农民

工工伤问题，而是把世界杯作为一种方法，观察农民工社群的面貌，并不断跟进事态发展，没有仅仅将笔墨停留于农民工看世界杯本身。

作者很好地处理了“自我陈述”和“制造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自我陈述方面，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关于自我与城市关系的自我阐述，如农民工主角陶辉的“可是你看别人舒服，别人看你不一定舒服”“可是看的人多，真正接触的人并不多，能沟通的又有几个呢”等言语，让读者能够更直接、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情感连接。

而作者的“制造他者”则优化为了“观察他者”，更多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叙述农民工观看世界杯这一事件的变化和细节，没有对农民工群体的行为和心里做出自我评价，并没有落入到以往农民工新闻报道的“苦难叙事”和“受爱护叙事”的俗套之中。如作者通过观察和书写观看世界杯的人数变化（从4个人到40个人再到1个人），以大屏幕前人物的流动来体现农民工在城市中艰难地谋生的同时，又给予了农民工群体充分的尊重。

作品的标题“无声的世界杯”也别有深意，不仅体现了农民工们在城市中的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地位，还隐喻了在社会上失声的农民工，在报刊上被“标签化”书写，形象被“他者化”描述。

而特稿《老去的工地》则提供了农民工群体报道的另一种思路，即寻找农民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与社会宏观环境的互动点。报道通过讲述农民工62岁的陈同复和53岁的徐绿山的老年农民工的具体故事，展现他们面临的就业难和年龄问题，聚焦老年农民工的现实生活，挑战了媒体中对农民工形象脸谱化的描述，突出了他们多样的经历和独特的挑战。

此外，报道还将老年农民工的个人境遇放在新冠、人口老龄化、建筑行业的年龄政策这些更为广阔的社会宏观环境下进行阐述，使他们的境遇跳脱出“他者”的桎梏，这些宏观环境是读者和超龄农民工所共同经历的。通过书写农民工与社会宏观环境的互动，文章不仅系统性地让读者切实了解到如今老年农民工的处境，还拉近了读者与老年农民工的距离。

结语

综上所述，现有的农民工新闻报道和其他弱势群体

的报道，常常基于主流社会的利益及价值观，通过书写“他者”形象从而满足建构自我权威的需要。因此，新闻记者应给予弱势群体充分的公共表达的权力，防止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施加于弱势群体，从而减少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社会的每个人享受平等的传播权利是社会文明的显著标志。而在如今的舆论场中，在传播场域中掌握资源优势的少部分人拥有了信息报道的权力，而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却处于普遍失声的状态。“报刊的权力和几乎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公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判断。”^[9]为使这一状况改观，新闻工作者应当摒弃“他者”观念，对弱势群体给予足够的温情和公正，帮助他们改善媒介境遇。新闻媒体不仅应当处理好“自我陈述”和“作者叙述”的关系，更应当重视弱势社群和社会宏观环境之间的有机互动。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 [2] 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J].新闻大学,2012(02):72-79.
- [3] 朱清河.场域理论视野下弱势群体媒介势弱的形成及其救助[J].新闻大学,2010(01):135-141.
- [4] 艾美华,郭彦伟.守望乡土:主流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8(03):34-36.
- [5] 关江娜.素描·突变·视角——网络媒体兴盛时期新浪网农民工媒介形象分析[D].西南大学,2011.
- [6] 李艳红.新闻报道常规与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广州城市报纸(2000~2002)对“农民工”报道的量化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116-123+128.
- [7] 王杰文.日常生活与媒介化的“他者”[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8):19-22.
- [8] 王贵斌,张建中.媒介、社会真实与新闻文化的建构[J].当代传播,2004(01):30-31.
- [9] 威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戴鑫、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10.